

◀ (上接12版)

要意义。“我在西方的生活改变了我对于西方文化的看法,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对日本文化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他提出现代日本文化是一种“杂交种文化”,而这一观点虽然看似缺乏新意,但却提示了日本文化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即杂交种文化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类型,具有与异质文化相融合的生命力。当然,加藤周一将中国的大陆文化、德意志文化视为典型的“纯种文化”,逻辑上有欠严密。不过他思考的出发点在于相对性,正如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将中国的大陆文化视为“纯种”,也是相对于日本文化而言的一种分类。

与加藤周一相似,战后有許多日本文人、学者负笈海外,在文化的差异与碰撞中反观日本文化。在《羊之歌》中,加藤批评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从自然特点中提取的“风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和辻哲郎针对季风型、沙漠型、牧场型三种风土类型进行考察,将日本归类于季风型风土,分析了各种风土类型中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阐明人的存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加藤周一认为“呈现在我面前的日本,她首先不是作为自然环境,而是作为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社会实体。与此相对应,加藤周一对于日本文化的观点与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有相似之处。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将文化类型分为



加藤周一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始终以冷静的头脑反思“何谓日本”这一终极的命题。他所创建的“九条会”仍然是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图为大江健三郎(左)和加藤周一(右)

“竹刷子型”与“章鱼壶型”,他认为西方的文化根源在于古希腊罗马,近代之后虽然学科分化,但文化在基底上是相通的;而日本在近代之后汲取西方文化,各个领域、集团却如同捕章鱼的罐子一样各自独立、壁垒深厚,缺乏横向的交流与连结。加藤与丸山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们关于翻译如何影响日本近代国家的对话集《翻译与日本的近代》也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必读书目之一。

《羊之歌》以《审议未了》作为终篇。加藤周一记录了经历过1960年日本修订安保条约这一历史的转折,自己的内心发生的又一次转变。《日美新安保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日本结束了半占领状态,战后的一个阶段就此终结。对于加藤

而言,作为一个生活在战后社会的人,人生的一个阶段也就此画上了句号。经过长年的思考、观察、阅读、书写,以及旅居海外的经历,加藤认为,“我已经不再去别处寻找生活,而是在当下的生活中尽我所能,觅我所求。”

《羊之歌》记录了加藤周一前半生所观察、体验、思考的吉光片羽,这是一个文人学者的精神成长史。同时,加藤也将自己作为一个样本,深入剖析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何等环境下成长,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羊之歌》出版之后,加藤周一继续以专栏的形式发表随笔,于《朝日新闻》连载《山中闲话》(1980年7月至1983年5月)、《夕阳妄语》(1984年7月至2008年7月),直至病重住院。这些随笔可以视为《羊之歌》的延续,然而加藤的视角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回顾自身经历,而是将目光转向外部的历史与现实,思考日本的文化与社会,旗帜鲜明地呼吁:正视历史、反对战争、反对修宪。例如,在题为《从“南京”回溯“旅顺”》(1988.8.23)的随笔中,犀利地指出日本人在纪念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时却不愿正视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刻意地加以遗忘。而“从伦理上看,杀害毫无抵抗的市民是罪恶的,这与国籍无关”。加藤周一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努力唤起日本读者已经遗忘的“旅顺屠城”,他指出不管是“旅顺”还是“南京”,日本政府都未将其忠实地告知国民,对于牺牲者毫不负责。在《宪法·海外派兵·国际合作》(1991.11.20)一文中,加藤周一开宗明义地指出“依据《宪法》,不可向海外派兵”,明确反对海湾战争

之后甚嚣尘上的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的论调。如今,他所创建的“九条会”仍然是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可见,加藤周一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始终以冷静的头脑反思“何谓日本”这一终极的命题。

2008年12月,加藤周一去世之后,《朝日新闻》在讣告中追思这位战后的文化巨匠:“在知识日益碎片化的时代,加藤周一以罕见的知性,以历史的视角整体性地评述日本文化,并将其与当今的政治、生活相联系。”

文学即思想

《羊之歌》被誉为“日语写成的最美的散文”,书中有许多文字隽永、冲淡深邃的章节,值得反复品味。《高原牧歌》的开头这样写道:

高原的夏天是从布谷鸟的叫声开始的。自从在信州追分村度过了中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之后每年七月我都能在此听到它的叫声。在浅间山麓的落叶松上,它的叫声穿得很远,清澈的空气为之泛起层层涟漪,反衬出周围大自然的静谧。从我到达林中小屋的那一刻起,东京的噪声就淡出了我的世界。满身汗水与尘土的集训、涩谷站熙来攘往的人流、夕阳下美竹町家里二楼的那间房子——统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布谷鸟的叫声,这里还有草坪和火山灰铺成的小径,有白桦树的树梢在微风中摇曳着指向蓝天,有在杂木林中飘来荡去的雾霭,还有浅间山变化莫测的地表和远处西边地平线上绵延着的紫色的八岳山脉。这里,高远的天空湛蓝无比,正午的积乱云气势磅礴,夜晚的星空璀璨夺目。(《羊之歌》112页)

然而,虽然文章充溢着牧歌的清雅趣味,那里有美景、隐遁者、休闲的运动,战争依然给牧歌的田园笼罩上浓重的阴影。加藤每次从高原回到东京,便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东京。文章最后一句是:“为了继续东京再发现之旅,我必须跑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回来。”这也预示了他在成年之后,获得游历欧陆,重新认识日本的体验。

《京都的庭园》以“我常去京都,只为见她”起篇,而文中关于恋人的记述并不多,反而是加藤描写的一个让他开悟的瞬间,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秋日午后,某禅寺的庭园中,神迹就这样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庭园的结构没有任何特别

之处,不过用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借景手法。它借用东山的斜坡做背景,前景是枯山水,而且,规模不大。但是,庭园里分分秒秒都发生着变化。斜阳的余辉刚刚照亮东山的黄叶,转眼间又幻化成一片阴翳,枯山水也在顷刻间沉入了灰色的最深处;眼看着太阳出来,光芒万丈,却不料银色的雨点竟有悄无声息地落在白色的沙子上,绿色的点景石如获新生一般,绽放出亮丽的光芒。这是一个庭园,又不是一个庭园。它表情丰富,瞬息万变,有欢喜,有悲伤,有绚烂,有沉郁。所有这一切都被微妙地统一成一种含蓄的“形”——除了“形”之外,大概也没有更好的说法——而且,分分秒秒都是“形”胜于“姿”。(中略)我在东京出生,在东京长大,却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东西——我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准确无误的对应关系。(《羊之歌》213-214页)

《羊之歌》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加藤周一已经从欧洲返回日本。这段追忆既是他京都的实际体验,也叠加了他在欧洲对于造型艺术的思考,尤其关于“形”的感慨,无疑受到雕塑家高田博厚的影响。青年时让内心震撼的景致,经过文化差异的思维历练,升华为精神的外化表现。

加藤周一曾经在评述日本文学时精辟地指出“文学即思想”。《羊之歌》作为一部随笔作品,雅致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教养学识,也凝聚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思考结晶。用“文学即思想”来形容这部作品,算得上恰如其分。

北京大学日语系翁家慧老师的译本忠实雅驯,与原作相得益彰。为了便于理解,涉及专有名词之处译者均添加了详实的注解,书后还附加了多达两百多条的人名、作品名注解,对于深入理解本书提供了相当的助益。北京大学于荣胜教授与加藤周一先生有着深厚的交谊,于教授撰写的中文版序不仅对于加藤周一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进行了清晰的归纳,而且记录了自从1987年秋加藤先生赴北京大学参会演讲(参见加藤周一《北京的秋天》),数次与加藤先生欢谈交流的亲身经历。《羊之歌》是加藤周一先生前半生的记录,而中国学者记述的交往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自传性随笔《羊之歌》的有益补充,体现出加藤先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是十分珍贵的记忆和文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



1946 文学的考察